

回鹘之佛教

杨富学 / 著

西域佛教研究丛书



XIYU FOJIAO YANJIU CONGSHU



人民出版社

回鹘之佛教

杨富学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回鹘之佛教

杨富学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编 830001)

新疆电力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25 印张 4 插页 280 千字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 500 册

ISBN7-228-04786-9/K·607 定价:17.50 元

0006410

西域佛教文化艺术研究丛书

总 序

对于完美的事物，人们往往爱用“中西合璧”来形容。这是一种存在，也是一种希冀，一种追求。数千年来，先贤们孜孜不倦地从事于此项伟业，即我们今日称之为东西文化交流的壮举，这大约也就是“丝绸之路热”历经一百多年而不衰的重要原因吧。

作为东西文化交流的载体，宋元以前，当然是以陆路为主，因此，无论从哪一方面说，西域（今新疆）都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东来西往的各种文化艺术流派，都通过西域。这块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对于这种东西文化交流的长河，除了承担部分载体以外，她们又以什么方式，打上一些什么样的烙印呢？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所说的到达两端的東西文化，都是经过了西域人民或多或少改造过的了。如果我们对于这种改造过程不去做过细的了解，那么，我们就无法知道东西文化艺术交融的结果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东西两极在怎样的情形下，才能互相吸收，达到水乳交融。这就势必提出一个问题，西域的文化艺术是怎样的？她的土壤是怎样的？前几年，有位日本学者曾提出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丝绸之路”像是烟管，东西文化如同烟，东西文化交流通过“丝绸之路”，犹如烟通过烟管一样，而烟管对烟是不会起任何作用的，烟在通过烟管时也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对于这种观点，我们是不能苟同的，因为不符合历史事实，也已为新疆所发现的文物古迹所否定。这种观点，在日本学术界也已受到了批评。

根据目前已掌握的考古资料，在距今四千年左右的时代，西域已经有了自己的文明史，西域最繁荣的时期，应是汉——唐这一历

史时期。汉唐时期,也正是“丝绸之路”最为兴旺、畅通的时期。形形色色的文化艺术,在不同时代,以汉、唐、波斯、贵霜、罗马等帝国为奥援,东渐西传,活跃在“丝绸之路”上,开出灿烂花朵,结出累累硕果。在众多的花果当中,无可否认,佛教文化艺术是花中之王,果中之冠。在中世纪,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宗教文化艺术是占据着统治地位的文化艺术。在此期间,除了佛教以外,先后传入西域的还有祆教、道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等。

约在公元前2世纪,即汉武帝时,佛教由古印度传入西域,然后东入阳关,以至中原,至公元15世纪衰败,佛教在西域传播了一千五百多年。在这漫长的年代里,西域佛教经历了一个传入、发展乃至没落的过程。佛教造像大约在公元二三世纪之交即已传入西域,其盛行当在四五世纪,这就是今天遗留下来的丰富的佛教艺术文物遗迹。西域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而又独特的地位。她不仅在佛典的流通、开窟建寺、造像绘画等方面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而且在文学、乐舞、戏曲等方面给予了无可估量的贡献。总之,西域佛教文化艺术在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史上,其地位是非常显赫的。

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是以保护、研究西域佛教文化艺术遗产为主要任务的科研单位。我们奉献上这套“西域佛教文化艺术研究丛书”,如果能增加读者对西域佛教文化艺术的点滴了解,如愿已足矣。

陈世良

1994年6月

序

黄心川

我国的佛教最早是由古印度经过陆路丝绸之路中段的西域传入的。中国古代史籍对西域有着不同的解释，一般认为，西域是两汉以后对于玉门关、阳关以西地区的总称。从狭义上看指葱岭以东的地区，广义则指凡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广大区域，包括新疆、中亚其它地区、印巴次大陆和欧洲东部等等。佛教传入新疆有南北二路：南路自天竺迦湿弥罗先传至于阗，复经疏勒、莎车、皮山、且末、楼兰（鄯善）等地而至敦煌；北路则自大月氏（今阿姆河流域一带）传至姑墨（阿克苏）、温宿（乌什）、尉头、龟兹、焉耆、高昌、北庭、哈密而入敦煌，自汉至唐，这里的佛教一直十分发达、昌盛。回鹘之佛教势力及文化遗迹就集中分布在丝路北道地区及河西走廊。史籍的记载和考古发掘表明，维吾尔族的祖先——回鹘人曾以高昌、北庭为中心建立过历时达400余年之久的高昌回鹘王国（848~1283年），在其强盛时，幅员相当辽阔，东起甘肃西端，西迄中亚两河流域，包括伊塞克湖地区在内，南自昆仑山北麓与于阗、喀什噶尔一线，北抵天山以北。高昌一带在汉朝时属车师前王国。班超曾于此国境内之柳中（鲁克沁）设西域长史，东汉以后佛教开始流行，在4世纪时已成了国教（见《出三藏记集》卷八）。据载，车师前王国国师曾向苻秦献梵本《大般若经》，著名的高昌僧人道普能通六国语言。高昌、焉耆、龟兹连同南道的于阗、疏勒都是当时西北边陲佛教活动的中心。麹氏高昌王国时期（502—640年），仅高昌地区就至少有130多座佛寺，高僧辈出，译经事业十分发达。公元7世纪中叶玄奘西行去印度途经高昌、焉耆和于阗时对这些地

回鹘之佛教

区佛教的隆盛情况在他撰写的《大唐西域记》中有详细的记录。著名的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西大寺、吐鲁番的柏孜克里克、吐峪沟、胜金口石窟、库车的苏巴什大寺、库木吐拉、森木塞姆、克孜尔尕哈石窟、拜城的克孜尔石窟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凿建的。回鹘人于9世纪中叶由漠北徙入西域建立高昌回鹘王国后,虽然仍奉摩尼教为国教,但对佛教采取扶持、奖掖的政策,使王国境内旧有的佛教在这一时期得以进一步发展。公元982年宋使王延德出使高昌,亲见这里有佛寺50余所,寺中香火繁盛,各有大藏经;北庭的应运太守之寺此时也持续繁荣(《宋史》卷490《高昌传》)。敦煌写本S.6551更是详载了高昌回鹘举国上下崇佛的情况:“帝主人王,实乃化身菩萨……善男善女,檀越信心,奉戒持斋,精修不倦。更有诸都统、毗尼法师、三藏法律(师)、僧政、寺主、禅师、头陀、尼众、阿婁师等,不及一一称名,并乃戒珠朗耀,法水澄清,作人天师,为国中宝。”

在回鹘西迁时,迁入河西走廊的那部分人也分别以甘州(今张掖)、沙州(今敦煌)为中心建立了两个汗国,同高昌回鹘一样,他们也尊奉佛教,由于受藏传佛教之影响,河西回鹘佛教比起高昌来,有着更浓重的密教色彩。他们开凿的石窟也不少,可见于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和酒泉文殊山石窟之中。

佛教在三个汗国中的传播促进了佛教艺术的发展,在前述高昌、龟兹及敦煌地区诸石窟的基础上,回鹘人又新开、重建了不少石窟,并绘制、雕造了不少艺术品。回鹘壁画、雕塑贴近生活,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壁画造型新颖,笔法简洁,色调热烈明快,装饰富有趣味性,以大量的暖色使气氛显得活泼、奔放。雕塑兼具东西方的风格,既承袭我国唐代造像的遗风,也受希腊式健陀罗艺术的影响,并呈现回鹘自身的特色。10世纪中叶伊斯兰教传入新疆以后的300年间,吐鲁番、哈密地区的佛教仍很流行,而河西回鹘直至17世纪末还有佛经写本出现,说明佛教仍在继续。尽管回鹘佛教

序

也显得很芜杂，佛教常常与摩尼教和民间信仰相糅合，大小乘和密教之间的门户之见相当明显，但是，回鹘佛教覆盖的区域广大，历史长久，寺院众多，高僧辈出，译经事业发达，佛教文化繁荣，不仅对西域而且对汉地佛教都有深重的影响。可见，回鹘佛教在整个西域佛教中占有显要的地位，有着十分重大的作用。回鹘佛教无疑地是中国佛教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鹘的佛教文明是我国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瑰宝。

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原地区在六朝的589年之前一般是经过西域地区的。佛教在西域地区传播、发展到繁荣的时期，也可以说正是西域佛教传入内地，并在那里生根、开花、结果的时期。当时，西域就有不少高僧到中原地区弘法，同时，内地也有不少僧侣、居士去西域求法取经，这些过往的僧人、学者自于阗的朱士行到唐朝的玄奘、义净无虑数百。他们从印度、西域取得大量的梵文经典后携归内地进行翻译以宣扬弘化，因此中原佛教无论在思想上、组织上或者文化、艺术方面都或多或少地受过西域佛教或由西域传入的印度原始佛教的影响，中国汉地佛教中某些学派、宗派就是把印度佛教、西域佛教加以改造，使之适应中土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此外，历史事实也告诉我们，汉地佛教及其文化艺术成长壮大之后反过来又通过丝绸之路回传至新疆、中亚乃至印度。例如在健陀罗后期佛教雕像中明显地可以看出中国唐风的影响。在这双向交流中回鹘佛教必然会起到重要传承的作用，这可以从回鹘佛教徒曾作为中原王朝与印度、波斯佛教界联系的中介一事看得出来，也可从佛教理论的弘化、佛教文学作品的创作、石窟的开凿、壁画的造型等方面得到印证，因此对回鹘佛教的了解、研究使我们可以弄清西域佛教和汉地佛教的关系，深入地了解中印佛教文化的历史和中国佛教发展的过程，以及回鹘佛教在汉地佛教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从19世纪中叶始，英、法、德、俄、日、美等帝国主义列强为了

回鹘之佛教

争夺中国新疆和中亚其它地区的霸权，纷纷派出名目繁多的传教士、使者、学人、探险家、考古队接踵而至进行“学术调查”、“考古探险”等等，在我国新疆的吐鲁番、库车、和田等地、河西走廊的敦煌和内蒙古西端的黑城等地获取了大批的古代佛教历史文献和文物，随后又组织人力进行学术研究，重点就放在对当地有着广泛影响的民族和宗教的研究之上，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可资借鉴。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这些研究中有相当部分明显地带有为帝国主义侵略目的直接服务的印痕，所以说他们的研究一方面为我们留下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和有参考价值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这些学术成果的局限性，特别是对那些明显含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必须予以批判，对其钻牛角尖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论也应予注意。

在西方和日本学术界的刺激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也一度出现了“西域研究热”和“佛教研究热”，不少学者对西域和敦煌出土的古代佛教和摩尼教的文献等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并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终因军阀混战、外敌入侵等等原因未能持续发展下来。全国解放后，随着党和政府对民族工作的重视，西域、敦煌的研究也再度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我们自己培养出了新一代的西域民族和历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并与国际学术界接轨，撰写了蔚为大观的研究著作，阐述了西域、敦煌诸地各民族的灿烂文化。现在摆在面前的这部《回鹘之佛教》一书就是敦煌研究院杨富学同志对这一课题的最新奉献。该书是我所知国内外系统研究回鹘佛教史的第一部专著，正如同他去年刚刚发表的《沙州回鹘及其文献》（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6月版）一书填补了沙州回鹘研究的空白一样，此书的出版，又填补了西域佛教史中的一个空白领域，这是值得欢欣鼓舞的。

杨富学同志在兰州大学历史系读书时即对维吾尔族历史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毕业时直接考入新疆大学历史系师从苏北海

序

先生专攻维吾尔族历史、语言与文献，毕业后又赴印度德里大学深造，学习梵文与佛教，他长期生活和工作在新疆和敦煌，对维吾尔族历史、文化、宗教及古代艺术有着切身的体会，兼备了研究回鹘佛教这一复杂课题所需的多方面条件，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有一种甘坐冷板凳的敬业精神，多年来一直全身心地投入到极其枯燥乏味的回鹘文文献的搜集、整理、翻译和研究之中，这部书便是他多年精心研究的结晶。

书中收集的回鹘史料极为丰富全面，他不仅搜罗了外国学者和我国学者已经刊布了的回鹘文献和他们的研究成果，而且也研读了大量的汉文史乘和敦煌、吐鲁番所出的佛教写本。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认真的鉴定，甄别其真伪，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对回鹘佛教进行了架构，对回鹘佛教的传播历史、译经情况、功德思想、寺院的兴建、寺院经济及佛教对回鹘文明的影响等问题作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探索。考虑到文献的缺乏和回鹘文本的收集、整理之不易，我可以想像得作者在撰写这部著作时必会遇到的种种困难，但作者还是尽了巨大的努力，以顽强的精神越过了撰写中的道道障碍。由于高昌回鹘和河西回鹘生活在广大的土地上，覆盖面宽，许多民族都逐鹿于这个地方，多种宗教和多种文化在这里汇合，加上复杂的地理条件以及目前资料还不很完备的状况，都对回鹘佛教和回鹘文明作出完全正确全面的阐述颇具困难，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但作者已尽了值得称道的努力，我渴望此书出版后能唤起更多的学者对回鹘历史和文明的重视，随着越来越多的回鹘佛教文献的发现与刊布和人们认识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将来有更多的和更好的著作问世。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此书不仅从民族的角度对回鹘的佛教历史作了阐述，而且也对受到佛教影响的回鹘文明，诸如文学、哲学、美术、书法、语言文字等作了相当有意义的描绘，因此，此书不仅是一部回鹘佛教史，也是一部回鹘的文明史。回鹘是一个善于接受外

回鹘之佛教

来文化的民族，她的文明既有自身的文化基石，又受到周围的汉、藏、粟特、吐火罗等民族文化的影响，也深深打着印度文明、波斯文明的烙印。这种文化的融合现象在该书中都有着具体的反映，堪称可贵。

1996年6月于车公庄

目 录

序	黄心川	(1)
前言		(1)
第一章 佛教在回鹘中的传播及其特点		(7)
第一节 佛教的产生及其东渐		(7)
第二节 佛教之初传回鹘		(17)
第三节 西域回鹘之佛教		(21)
第四节 河西回鹘之佛教		(47)
第五节 回鹘佛教的特点		(54)
第六节 回鹘佛教对北方诸族的影响		(65)
第二章 回鹘之佛典翻译		(72)
第三章 回鹘佛教之功德思想		
——从回鹘文《七星经》回向文谈起		(151)
第四章 寺庙的兴建		
——以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木杵铭文为据		(176)
第五章 佛教寺院经济		
——回鹘文《佛教寺院免税书》研究		(198)
第六章 佛教与回鹘文化		(211)
第一节 佛教与回鹘语言		(211)
第二节 佛教与回鹘文学		(217)
第三节 佛教与回鹘书法		(230)
第四节 佛教与回鹘艺术		(239)
第五节 佛教与回鹘哲学		(253)
缩略语表		(261)
回鹘佛教研究文献目录		(264)

229/05

CONTENS

Preface Huang Xinchuan (1)

Introduction (1)

Chapter I : Buddhist History of the Uighurs (7)

 Formation of Buddhism and Its Spreading eastward
 (7)

 First Stage of the Uighurs getting in touch with
 Buddhism (17)

 Buddhism of the Qoço Uighurs (21)

 Buddhism of the Hexi Uighurs (47)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ighur Buddhism (54)

 Influence of the Uighur Buddhism upon 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of Northern China (65)

Chapter II : Uighur Buddhist Texts (72)

Chapter III "Puyan" Thought of Uighur Buddhists (151)

Chapter IV : Establishment of the Uighur Buddhist
 Temple (176)

Chapter V : Economy of the Uighur Buddhist
 Monasteries (198)

Chapter VI : Buddhism and the Uighur Culture (211)

 Buddhism and Uighur Language (211)

 Buddhism and Uighur Literature (217)

 Buddhism and Uighur Calligraphy (230)

 Buddhism and Uighur Art (239)

 Buddhism and Uighur Philosophy (253)

Abbreviations (261)

Bibliography (264)

前言

维吾尔族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明的民族之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维吾尔族先后信仰过萨满教、摩尼教、佛教、景教、袄教，最后才改信了伊斯兰教。由于宗教信仰的变化和周边民族的影响，他们先后使用过古突厥文、回鹘文、摩尼文、婆罗谜文和阿拉伯文等形式的文字（有时还使用藏文），用这些文字撰写了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如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乐智慧（Kutadū Bilig）》）、语言学著作（如麻合穆德·喀什葛里的《突厥语辞典（Diwanu Luyat at-Turk）》）、史诗（如《乌古斯可汗的传说》）、碑刻及天文历法、卦书、医书、相书、梦书等，并记录和保存了大量有关社会历史、经济方面的文献，还有内容更为丰富的宗教方面的著作。

今天的维吾尔族约有 700 万人，全民信仰伊斯兰教，但在历史上却并非如此，在 9~15 世纪间，他们的绝大多数都是佛教徒，他们用回鹘语文翻译佛教经典，创作佛教作品，开凿佛教石窟，绘制佛教壁画，使佛教文化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他们一方面从周边同一信仰的民族（如汉、藏、粟特、吐火罗）及印度诸族那里汲取自己所需要的营养，同时又对周边诸民族（如藏、西夏、契丹、女真、蒙古）的佛教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回鹘佛教是中国佛教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在回鹘中的长期流行，又反过来直接影响着回鹘的历史与文化，以致成为回鹘文化史、思想史、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研究佛教对回鹘历史文化的影响，就不能写出真正的维吾尔族史，

回鹘之佛教

尤其是维吾尔族文化史。

遗憾的是,随着古代维吾尔族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宗教信仰的改变,回鹘文逐渐被弃用,最终成了不为世人所知的“死文字”。尤其是在伊斯兰教传入吐鲁番等地区后,那里的回鹘文佛教典籍曾遭到大规模销毁,寺院被破坏,只有那些劫后余孤因被埋藏于地下才得以幸留于今,向人们诉说着昔日回鹘佛教的繁荣和文化的昌盛。

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的文化能象回鹘文化那样多地受惠于地下发掘材料。公元20世纪以前,人们对回鹘佛教文献茫然无所知晓,学界对回鹘文化的了解仅仅局限于汉文及穆斯林史料中一鳞半爪的记载^①和传世的几件回鹘文献。19世纪上半期,德国学者克拉普洛特(J. Klaproth)就根据传到欧洲的明代回鹘文献《高昌馆课》一书的抄本,对古代维吾尔语文进行了研究,于1840年在巴黎出版了《回鹘语言文字考(Abhandlung über die Sprache und Schrift der Uiguren)》。19世纪下半叶匈牙利突厥学家万贝利(H. Vambery)和法国突厥学家古尔太勒(Pavet de Courteille)研究了用回鹘文写成的属于伊斯兰教时期的突厥语文献。前者于1870年研究刊布了维也纳收藏的回鹘文本《福乐智慧》的部分内容,^②后者研究刊布了用回鹘文写成的《升天记(Mirajname)》、《圣徒传(Tazkira-i awliya)》等。19世纪末,俄国著名突厥学家拉德洛夫又研究、翻译了《福乐智慧》全书和《乌古斯可汗的传说》及其它一些用回鹘文写成的晚期伊斯兰文献。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当时回鹘文佛经写本还没有被发掘出来。

① М. М. А. Казем-Бек,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об уйгуах. -- Журнал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Народного просвещения, СПб., 1841, ч. XXXI, отд. II, стр. 37~122.

② H. Vambery, *Uigurische Sprachmonuments und des Kudatku Bilik*, Leipzig 1870, 272p.

前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西方列强掀起了一股争赴新疆、敦煌诸地考古探险的热潮,发现了大批的写本、刻本残卷(包括书写、刊刻于纸、皮革、棕榈叶、桦树皮、木板、竹子、丝绸等凡可用于书写的材料)和其他文物,如雕塑(包括泥塑、木雕、铜雕)、绘画(包括壁画、绢画、麻布画、木板画)、刺绣、陶器、印玺、钱币等。我们这里所谈的回鹘文佛教文献就是这些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

这些文献刚出土不久即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不少人都投身于对这些文献的释读、研究与刊布,涌现出一大批研究专家,最早的如德国的缪勒(F. W. K. Müller)、勒柯克(A. von Le Coq)、邦格(W. Bang)、葛玛丽(A. von Gabain)、俄国的拉德洛夫(W. Radloff)、马洛夫(S. E. Malov)和日本的羽田亨等,继之又有德国的茨默(P. Zieme)、罗伯恩(K. Röhrborn)、法国的哈密顿(J. Hamilton)、英国的克劳逊(G. Clauson)、匈牙利学者卡拉(G. Kara)、日本的山田信夫、小田寿典、梅村坦、森安孝夫、百济康义、庄垣内正弘、俄国的土谷舍娃(L. Ju. Tugusheva)、土耳其的阿拉特(R. R. Arat)和提肯(S. Tekin)等一大批回鹘文专家。他们从收集支离破碎的资料入手,整理、释读,筚路蓝缕,前赴后继,终于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果,人们对回鹘佛教乃至整个回鹘文明的重新认识,可以说都是以回鹘文献的发现、研究为先导的。

我国对回鹘文献的研究起步较晚,发轫于本世纪50年代。在此期间,冯家升先生先后发表了《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考古学专号丙种一号,北京,1953年)和《刻本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研究——兼论回鹘人对于〈大藏经〉的贡献》(《考古学报》1955年第5册,第183~192页)和其它一些研究回鹘文世俗文献的著作,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继他之后,耿世民先生展开了更大规模的研究工作,发表了一大批重要的研究成果。他所研究的文献大都收藏于我国,如《弥勒会见记》(哈密本)、《玄奘传》、《八十华严》、《阿毗达磨俱舍论》等,这些都是由

他首次译释、研究、刊布的，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突厥学界对回鹘文献进行全面研究的工作。

国内外学者对回鹘文佛教文献的研究已进行了八十多年，先后发表的各种回鹘文佛教写(刻)本已达千余件，分属八十余种佛典，更有为数不少的佛教诗歌、祈愿文、忏悔词等，为我们认识古代回鹘佛教的历史情况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资料。但由于对这些文献的研究大多是由各国的语言学家进行的，他们对回鹘佛教历史的研究涉及不多，而治佛教史的专家又大多不通回鹘语文。尽管近一个世纪来各国学者对回鹘文佛教文献进行过整理、刊布，但研究著作又分别是用德、英、法、匈牙利、俄、日、朝鲜、土耳其、汉、维吾尔等多种文字写成的，若无直接阅读原文的能力，就要利用刊布者的研究成果，这就要求回鹘佛教研究者不但应兼通上述诸种文字中的数种，而且须运用科学方法来分析对比，这就增加了研究上的难度。因此之故，直至今日，世界上尚未有一部全面研究回鹘佛教史的著作，堪为学术界之一憾事。本书的主旨就是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现已刊布的回鹘文献作为基本资料，结合西域、敦煌的回鹘佛教艺术、汉文写本以及汉籍史乘的记载，对回鹘佛教的传播历史、佛典翻译情况、僧徒之功德思想、寺院的兴建、寺院经济及佛教对回鹘文明的影响等问题尽可能全面地作一考察。

由于回鹘无专门佛学著作传世，故这里无法探讨回鹘之佛学思想，在探讨其佛教历史时，也只能侧重于零散资料的整理、汇总与分析上，故显得支离破碎，而无法写出像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西藏佛教史甚或西夏、蒙古、傣族佛教史那样系统、全面且有血有肉的著作，给人的印象总是干巴巴的。在资料的取舍上，尽量不漏掉国内外已刊的可资利用的资料，但又无法把这些资料(尤其是回鹘文佛典)一一录出，故在介绍回鹘译经时就显得繁简失调。就全书的结构而言，也有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如无专章研讨回鹘之佛教思想，仅在各章节中偶有提及；第三、四、五章实际上是文献研